

记忆与再现

明清近代诗文研究论集

罗时进 主编



苏州大学出版社
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记忆与再现

中国美术学院美术考级教材

浙江美术学院考级教材

记忆与再现：

明清近代诗文研究论集

罗时进 主 编
黄建林 副主编

苏州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记忆与再现：明清近代诗文研究论集 / 罗时进主编
— 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8.4
ISBN 978-7-5672-2320-2

I. ①记… II. ①罗… III. ①古典诗歌—诗歌研究—中国—明清时代—文集②古典散文—古典文学研究—中国—明清时代—文集③诗歌研究—中国—近代—文集④散文—文学研究—中国—近代—文集 IV. ①I206.48-53
②I206.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98752 号

记忆与再现：明清近代诗文研究论集

罗时进 主编

黄建林 副主编

责任编辑 周建国

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苏州市十梓街1号 邮编：215006)

苏州市深广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地址：苏州市高新区浒关工业园青花路6号2号厂房 邮编：215151)

开本 787 mm×1 092 mm 1/16 印张 30.25 字数 628 千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672-2320-2 定价：98.00 元

苏州大学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本社负责调换

苏州大学出版社营销部 电话：0512-65225020

苏州大学出版社网址 <http://www.sudapress.com>



序

罗时进

序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在近三十多年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呈现出繁荣的局面,其中一个重要标志是研究领域的扩大。以明清文学来说,受“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观念的影响,过去普遍重视对小说、戏曲的研究,而诗文研究则比较冷落。1983年著名学者钱仲联先生在苏州大学中文系倡导并领衔成立了专门研究明清诗文的科研机构——明清诗文研究室,担负起研究明清诗文作家,整理相关古籍,培养专门人才的重任。1984年开始了后来享誉海内外的巨著《清诗纪事》的编撰工作,同年于苏州大学召开首届全国清诗研讨会,从此拉开了国内新时期明清诗文研究大幕,使这一研究领域展现出宽广的发展前景。

为适应研究的需要,《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于1984年创办了《清诗研究》专栏,后改为《明清诗文研究》,再改为《明清近代诗文研究》,栏目所标识的研究边界遂稳定下来。从初创至今,已经三十多年了。这应该是国内高校学报创办最早,历时最久、受关注程度最高的专门研究明清近代诗文的学术平台。它长期以来得到海内外相关专家、学者的支持,他们将最新研究成果在这个学术窗口展示,这是该栏目稳定、持续、向上发展的重要保证。

2014年,恰当该栏目进入“而立之年”时,被教育部批准列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报名栏”。这是对《苏州大学学报》工作的肯定和鼓励,对《明清近代诗文研究》建设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作为“名栏”,学校和学报都投入了很多的精力来办,许多著名学者、富有影响的中年学者和成长中的青年学者给予了很多支持,使该栏目的论文质量和学界影响不断提升。如果说一个学术专栏能够具有某种前沿性,那么其关键因素是能够组织和汇聚学术力量,而专家和学者的思维广度、深度、高度,是栏目水平的标志,也是栏目的显示度。仅近五年,该栏目就发表了约百篇论文,一大批学者将学术思维的光束投射到《明清近代诗文研究》上,这里便有了火树千枝的盎然光彩。

为了总结这一名栏创办、发展的情况,这里我们选择了部分论文,汇集成《记忆与再现:明清近代诗文研究论集》。以“记忆与再现”为题,是基于我们对文学史研究功能的理解。我们研究的对象是过去的,已经成为历史的一个部分。其内容有些得

到了一定程度的揭示,很大部分仍被遮蔽着,而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中,明清近代诗文被遮蔽的部分最大。人们对明代以来大量诗文家曾经的存在和修为往往缺少了解,很少注意到他们生命历程中的思考烙印和创作履迹,需要通过对记忆的“校订”“笺证”使之得到再现。

对历史的记忆,都具有一定的选择性;所谓的再现,也是经过重读后的选择性呈现。正如“像”是客观的、自然的,但“成像”却具有一定程度的主观记录和个性处理的色彩。因此文学史的记忆与再现的过程,实际上是包含今人审美观念与精神取向的一种重写。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对明清近代诗文发展历史的再现,其目的不在于拨开时间的雾障对史实进行实录,而是对14世纪中叶以来的文学史进行全幅式的考量与重写。

重写文学史,是学界多年来的期盼、呼唤。它一方面要求对已有的叙述、结论做新的评价、认知;一方面要求更多的重要作家、作品、现象进入研究视野,构成比较完整的文学史体系。对于明清近代诗文来说,这两方面的工作都要投入极大的精力来做,那些似乎熟悉的论题自然有再讨论的空间,而那些缺失于传统文学史的有价值的作家和创作应当“被看见”。中国文学史上“明清近代诗文”的坐标体系和整体框架都需要重新建构,此事任重而道远。

此次选编的是2012年至2017年发表在《明清近代诗文研究》栏目中的部分论文。全书分成文学现象研究、文学批评研究、文体与流派研究、家族文学研究、地域与社团研究、作家创作研究、文献考论七个部分,这些是该栏目所刊载论文的基本内容,大体来说也是明清近代诗文研究的知识架构。当然,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学者也许都有自己的学术理解图式,我们做这样分类,一定程度上希望反映出明清近代诗文研究的一些主要方向,或重要问题。

明清近代诗文史,从宏观态势上说,是在以往历代文学发展基础上演进的,具有反思性、丰富性、集成性的特点,然而整个过程不断产生对蹇、徘徊、起伏,若具体论及明代、清代、近代的诗文状况,其间各个历史阶段都有自身的特点,而各阶段的个别特征显然大于普遍特征。

但基于历史与文学史之间的共生关系,同时注意两者之间的区别意义,人们仍然可以发现14世纪中叶以后一系列“有意味”的文学史实,即擅文者极众,文学家队伍庞大,而历史变动剧烈,事件连续不断,这对文人心理状态和出场姿态影响深刻,使诗文创作、理论批评的主题、内容、风格乃至属性屡屡发生变化。而正由于处于“紧张”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关系中,文人的地域与乡园情感突显,社会底层文事更盛,文学创作数量剧增。这是明清近代诗文研究重视作家与作品的包容性,注意文体与流派的广泛性,同时对家族文学、地域与社团给予特别关注的主要原因。

这里顺便谈一下研究的理论视野与方法路径问题。近些年包括明清近代诗文在内的古典文学研究,引入了不少新理论、新观念、新方法,都有必要,应当看到这种引入使问题旨趣、研究视角变化,产生了不少值得注意的成果。但并不是所有的



理论、观念、方法都适用于古典文学研究。“回归传统”无须作为口号,但研究者应该重视和尊重传统。《明清近代诗文研究》栏目发表的论文,虽有一些是基于新理论、新方法的,但更多的还是以传统方法进行研究的成果。该专栏发表的文献考论方面的论文其实并不多,但此书仍然专列一编,以表明实证是明清近代诗文研究的必要路径之一。

如果说若干年前明清近代诗文研究可谓“星光稀落”的话,如今的情景则可用“月印万川”来形容了。不但学者们多关注这一领域,学位论文选题也往往着眼于此道。《明清近代诗文研究》栏目伴随、见证了这一过程,也起到了推助转变的作用。今天我们回顾《明清近代诗文研究》创办三十多年的历史,对钱仲联师充满了崇敬与怀念的情感。钱先生是明清近代诗文研究的倡导者、开拓者,勋绩至伟。他既高擎大旗,又长期进行深入研究。在编辑本书的日子里,我将自1984年初至眼下《苏州大学学报》该专栏发表的300多篇论文目录浏览了一遍,统计了一下,钱先生发表于该专栏的成果有12篇之多,而且影响甚巨的《顺康雍诗坛点将录》《道咸诗坛点将录》《南社吟坛点将录》《吴伟业重要佚诗前〈东皋草堂歌〉考》《清代诗词二十名家评述》等都发表在这里,成为《明清近代诗文研究》最具有标志性和荣誉感的成果。

2018年,是钱仲联师诞辰110周年。在2018年足音渐近之际,我们编辑出版《记忆与再现:明清近代诗文研究论集》敬献给钱先生,以表达对他的无限怀念和深情纪念。相信明清近代诗文研究者对钱仲联先生的记忆永存,现在和将来的相关研究定会不断再现他的学术观点、学术思想和学术精神。

谨书以上,聊充序言。

2017年12月28日于苏州大学子实堂



目 录

序	罗时进	1
---------	-----	---

第一编 文学现象研究

集群流派与布衣精神

——清代前期文章史的一个观察	曹 虹	3
明清竹枝词中的女性生活史记述及其意义	朱易安	12
焚稿烟燎中的明代文学影像	罗时进	27
论晚明词坛与清词之复兴	张仲谋	40
文人游幕与清初戏曲		
——兼论万树词人与戏曲家身份	朱丽霞	50
抵制“东瀛文体”：晚清古文革新的挫折与回潮	姜荣刚	61

第二编 文学批评研究

蒋士铨诗学观念的转向	蒋 寅	75
论袁枚的“以棋喻诗”说及其源流	叶 晔	83
袁枚的咏史诗批评观念与风格追求	马 昕	94
王先谦《骈文类纂》的文学批评建树	路海洋	109
明清回族文论的话语融通问题	孙纪文	119



第三编 文体与体派研究

明初台阁体的生成及泛衍·····	饶龙隼	131
《文通》与明代文体学·····	何诗海	141
明代赠序文中的政治文化·····	张德建	149
词调三分与词学转型·····	陈水云	163
王鏊对明代八股文定型的影响·····	严明 张荣刚	172
“性情独运”理论主张下的尤侗骈文创作·····	杨旭辉	182

第四编 家族文学研究

明清毘陵庄氏家族文学雅集与姻娅关系·····	萧晓阳	195
清代文学世家的家族信念与发展内动力·····	徐雁平	205
论清代常熟屈氏家族女性的文学活动与传播·····	梅新林 姜欣星	217
《画话》《井蛙鸣》及作为文艺家族的翁氏·····	张剑	229
论清代临桂况氏文学家族的重“法”传统·····	王德明	239
江南家族与学术共同体		
——以涉园张氏家族为例·····	沙先一 秦敏	248

第五编 地域与社团研究

20 世纪高启与吴中诗派研究·····	左东岭	261
浙东文人群与明前期文坛走向		
——从“元正统论”视角观照·····	邱江宁	274
社团领袖与诗界精英:明清之际山左莱阳宋氏家族论·····	王小舒	289
论明清之际中州与吴地的文学互动		
——以归德府为中心的考察·····	梁尔涛	300



清初江南地区诗社考

——以陈瑚《确庵文稿》为基本线索	朱则杰 李 杨	310
理学与桐城诗学	潘务正	319
清代榕皋女弟子与“娑罗花”雅集	丁小明	333

第六编 作家创作研究

诗情心路张太岳

——关于张居正诗歌的文化解读	郭万金	347
论唐寅诗歌的俗化倾向	朱 雯	360
曾国藩治兵诗文的创作意图与文体新变	左鹏军	371
蒙汉诗歌交流视域中的那逊兰保创作	米彦青	383
王韬诗歌尚“奇”主“变”论	陈玉兰	391

目 录

第七编 文献考论

《送东阳马生序》人物考	周明初	407
论清人编宋诗选本的地域不平衡性	马卫中 高 磊	418
清代诗人施兰垞及其文学活动考论		
——兼谈袁枚《答沈大宗伯论诗书》的写作时间问题	范建明	426
论鍾狮《锡庵公墓表》的文献价值		
——《警富新书》新证	赵杏根 殷虹刚	439
近代诗人杨圻晚年行迹与创作		
——以新发现的散佚诗稿为中心的解读	周兴陆	450
葵晔·待麟：罗郁正与清诗英译	江 岚	461
后记		472

第 一 编

文学现象研究



集群流派与布衣精神

——清代前期文章史的一个观察

曹虹

有清一代文章史,雅才林立,舒文载实,迭相照耀。其经纬所在,尤可于集群流派观之。三百年间,不乏名家并称与文派兴替,或因境遇相似而可资合观,或因声气相应而自成派别。举其荦荦大者,除桐城派最具声势绵历亦久之外,计有清初遗民社群、鸿博词人、毗陵四家、清初三大家、国朝八家、阳湖派、仪征派、道咸经世派、新民体、海外游历之文家、女性文家诸项。晚清张祥河在为姚椿《国朝文录》所作序言中,对乾嘉之际以前清文的分期与文风演变归纳为:国初诸老“有驳有醇”,康熙中叶至乾隆之末“一轨于中正”,乾隆之末以降“文体复歧出”^①,奇正间的张力牵挽,形成了极富清代特征的文章史演化轨迹。兹以乾隆之末为界划分前后期,清前期较有历史标识意义的集群流派,当数遗民社群、鸿博词人、毗陵四家、清初三大家和桐城三祖。尽管挽奇入正是这个阶段的大趋势,但在这些流派集群的诞生及前后衔接联系等方面,布衣精神作为聚合元素与文学素质隐然存在,于此亦可彰显文坛脉动的时代感和文学生命的精神魅力。

一、遗民社群何以能“操文柄”?

王文濡《国朝文汇序》曰:“顺、康之世,遗老闻人,伟略豹隐,著述文身,辞之至者,自成一子。”^②“豹隐”意味着割断与仕途的任何联系,独立意志与人格气节从而得以保证。归庄《与王于一》称美友人顾炎武曰:“此兄非止独行之士也,贯穿古今,指画天地,深心卓识,弟所师事。”^③清代文章学的重开风气,其主导作用就是由这一批“独行之士”带来的。这一批“穷而在下者”,身历沧桑巨变,其深心卓识在悲怆与反思中淬炼,具有将天地元气贯注于人格与文学上的双重自觉,因此在审美取向上易于声气冥合,富于激扬风气的能量。江南武进人瞿源洙为同乡遗民任源祥《鸣鹤

* 作者为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由《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13年第3期全文转载,《新华文摘》2013年第7期摘编。

① 姚椿《国朝文录》卷首,清咸丰元年终南山馆校刊本。

② 沈粹芬等《清文汇》,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3页。

③ 归庄《归庄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315页。



堂诗文集》撰序称：“古未有以穷而在下者操文柄也……独至昭代，而文章之命，主之布衣……闾巷之士不附青云而自著，此亦一时风声好尚使然乎！”文中又曰：“昭代人文屈指可数，雪苑盛于北，而侯朝宗为之雄；金精盛于南，而魏冰叔为之冠；由雪苑而北，则有阳曲傅公；由金精而南，则有番禺屈氏，此虽号胜国遗民，而长林丰草之中沾濡多矣。”^①这可谓及时总结了清初遗民文人社群在当时主导风会的特点，十分耐人寻味。遗民布衣文人中也出现以一定的师门和地域因缘形成盟友群落，并不乏广泛地奔走与交流。这种思想上的根基感与联络上的流动性，也有助于遗民群体的创作理念成为时代的风向标。

清初遗民力量的壮大与明季党社运动的激发分不开，其中复社的影响最为突出。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周岐”条曰：“复社诸君，多以文章经济自负。”^②承接东林党“以天下为任”的学风，复社的宗尚在于兴复古学、务为有用。明末清初实学思想自此潜兴。复社成员富于经世热情与名节意识，社事以文章气谊为重，如黄宗羲、顾炎武、归庄、方以智、万寿祺、徐枋、王猷定、贺贻孙等，绝大多数后来成为遗民中坚。以“文章气谊”命世的遗民文人虽不尽出于复社，但复社高才及其子弟往往在经史之学上不乏较好素养，文学上张扬天地元气，秉持风雅古义，以救亡扶衰为己任，既心系天下又笔致博丽，故在遭逢天崩地坼的易代之际，对于转移文章风会，最富推动力。

正如黄嗣艾在《南雷学案》中称赏王猷定“力矫公安、竟陵之习，重开风气，是亦足多矣”，清初文章风气的“重开”，与遗民集群矫时救弊的文坛使命感有关，且颇有赖于复社文学力量在清初的延续。因明代复古派、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各种流衍皆汇入复社，复社内部颇多营垒，不乏排诋异同之论。易代之际，随着俗世倾轧因素的消解，以及全面反省晚明士风及文风危机，攻讦偏执之习受到一定抑制，有些在诗歌上推崇前后七子的人，并不排斥文宗唐宋派诸家，尤其可贵的是他们具有向往独立理性的文学精神，即黄宗羲《明文案序》所言“士之通经学古者耳目无所障蔽，反得以理既往之绪言”^③。

明季以复社为枢纽的社局，在地域上分布甚广，覆盖南直隶、浙江、湖广、河南、山东、江西、广东、福建等南北诸省，且以家族、姻亲、师生、朋友等关系纽带彼此联结、前后相承^④，这一党社运动的结构形态也影响到清初遗民文人间的聚合与呼应。《清稗类钞》“文学类”论“散体文家之分派”时，首先主张：“至遗民之以文名者，则推顾炎武、黄宗羲、陈宏绪、彭士望、王猷定诸人。”这几位代表人物籍贯所属，分别为江南、浙江、江西，恰也是遗民聚合最为活跃、遗民之文最富成就的地区。文章学的区域资源也成为地域性特征的底蕴。例如，在江南，晚明复古与反复古思潮的激荡较量

① 任源祥《鸣鹤堂诗文集》卷首，清光绪十五年重刻本。

② 朱彝尊《静志居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63页。

③ 黄宗羲《黄宗羲全集（十）》，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7页。

④ 何宗美《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续编》，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57页。



最为活跃,唐宋派的古文传统也在此发源延续。顾炎武、归庄、徐枋、朱鹤龄等一批吴中遗民在辞章上卓然成家。顾炎武传世文章作为一家言,堪称不朽,其历练于经世学问的文章,在清代文坛树立起“学者之文”的新典范。

再如黄宗羲及其浙东学友弟子群的文章亦富盛名,受黄宗羲的影响与指授,李邨嗣、郑梁、万言、邵廷采等在康熙年间文名骤起,形成甬上古文作家群,他们的团体活动有“甬上讲经会”,黄宗羲《翰林院编修怡庭陈君墓志铭》记载:“甬上有讲经之会,君与其友陈赤衷等数十人,尽发郡中经学之书,穿求崖穴,以立一闾之平……甬中多志行之士,由此会为之砥砺耳。”^①他们对黄宗羲的古文成就及意义领会深刻,如李邨嗣《答溧阳周二安书》曰:“仆故谓梨洲之文实驾二川而上之,以为直接欧、曾可也。”^②“二川”即明代唐宋派归有光(震川)、唐顺之(荆川)。由于黄宗羲的经史之功非同寻常,文章复古而不求形似,所以虽受吴中文家启迪而能别具面目。黄宗羲对李邨嗣的同气相求甚表欣慰,在为他写的墓志铭中曰:“先生不以余空隙一介之知而忽之也,自此转手,大放厥辞,同里稍稍响应,翻然于不迪,于是东浙始得古文正路而由之。”^③黄宗羲还汇集数十名浙东学者著作而成《东浙文统》,对形成地域宗风富于热情。梨洲学术文章绵泽颇深,后学如黄璋、黄炳堃、郑性、全祖望、邵晋涵、章学诚等亦知名。

各地遗民亦不乏突破地理界限,形成远距离同气连枝。这种寄寓遗民幽怀的游踪,有时也成为遗民刻意营造的生存常态^④,对遗民交往及文章创作影响匪浅。顾炎武、归庄、孙奇逢、屈大均等著名遗民都曾经远游他乡,如顾炎武于顺治十四年(1657)以二马二驴载书北游,屡拒其甥南返安度之邀;傅山甲申(1644)后以“太原人作太原侨”^⑤自视,取无家之意,在其所居太原松庄先后接待了顾炎武、阎尔梅、申涵光等多位遗民。还应当一提的是,江南遗民的学术文章得以扩大交流的条件,还包括某些遗民亲友的招揽。如康熙朝达宦徐乾学借舅父顾炎武这层关系,比较容易地将那些不愿与清廷合作的山林遗逸延至幕下。^⑥万斯同、顾祖禹、刘献廷、黄百家等纷纷受邀修书,不啻是遗民的自由聚会。^⑦清初以经史地理之学寄寓经世之志的学风与文风,昆山徐乾学幕府是一个据点。无锡顾祖禹的《读史方輿纪要》,卓尔堪评为“经世不刊”^⑧之书,即在康熙十九年(1680)撰写于徐乾学府第。周亮工以南京刻书业为依托,大力资助遗民友朋的著述编刊,亦成为遗民

① 黄宗羲《黄宗羲全集(十)》,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433页。

② 李邨嗣《杲堂诗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657页。

③ 黄宗羲《黄宗羲全集(十)》,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398页。

④ 孔定芳《清初明遗民的“云游”行为及其意蕴》,《人文杂志》,2005年第3期。

⑤ 傅山《霜红龛集》卷一三《口号十一首》其三,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⑥ 尚小明《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60-70页。

⑦ 艾尔曼著,赵刚译《从理学到朴学》,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1页。

⑧ 卓尔堪《明遗民诗》卷二,中华书局1961年版。



文学流通的一个据点。

遗民诸老散文是清文最初的高峰,多至情至理之言。其“学者之文”的范型自觉,下开此后文坛特别是乾嘉时代质实重学的倾向。其叙事文章夹带小说风韵,兴味盎然地发掘和描写生活中的义士与异人,他们往往多与长林丰草相亲或不屑于官门权势。如黄宗羲在《思旧录》中评价王猷定的笔力曰:“其文如《汤琵琶传》《李一足传》《寒碧琴记》,亦近日之铮铮者。”这类熔叙事、传奇、寓言于一炉的作品,在清初大放异彩,名篇尚有侯方域《马伶传》、王猷定《义虎记》、魏禧《大铁椎传》等。黄宗羲编《明文海》,收录《舵师记》《渔记》《马伶传》《汤琵琶传》《记女医》等作品。这类作品除了借传奇手法伸张天地正气外,也丰富了叙写“独行”之品的底层人物的古文经验。

二、鸿博词人、“毗陵四家”与“国朝三家”的多元背景

随着清朝步入盛世,较能体现庙堂雅正趣味的集群纷纷出现,鸿博词人之文的登场、“毗陵四家”的酝酿、“清初三大家”的标举、桐城派的命世都是显例。虽然康熙中叶至乾隆之末文坛风尚趋向于“一轨于中正”,但在导向雅正轨迹的背后,文人的布衣情致与批判精神也不是顿然消亡的。

以鸿博词人之文的登场来看,康熙十八年(1679)、乾隆元年(1736)两开特科,一时学问渊通、文藻瑰丽之名儒硕彦多与其选。鸿博词人不论本人在意与否,客观上荣显一时,成为俗世表率,并因此而影响一时的文风与文体取向,尤其是某些杰出的鸿博词人如朱彝尊、潘耒、杭世骏、齐召南等出自江浙,东南名士喜于追效,在江淮以南、吴越之间衍为流派,大抵涉猎书史,所为之文以绩学为底蕴,不失修洁之品。^①及高才为之,尚能于包罗宏富中,达高朗卓铄之境。虽然鸿博词人在朝廷求贤右文的制度机遇下成为一个群体存在,但不可忽视的是其文化人格具有多元背景。尤其是康熙鸿博词人群中,不乏遗民或布衣背景,其博学旨趣往往具有一定的批判精神。施闰章《赠杨生序》慨叹“天下之大,四海之广,求一文人焉未易得也”,认为其症结在于时人“目未周六经而驰骛于稗官之册,口未谐四始而涉猎于诗赋之文,或屈首八股,终岁呶唔一编”^②。这种对空疏文人的惩戒,仿佛延续了遗民学者对“文人”角色的反省。鸿博词人之所以纷纷抱定宗经之旨,除了是因为应承朝廷“阐发经史,润色辞章”的诏令之外,也因为吸取了鼎革之际学界反省之成果。晚明遗老历经社稷丘墟、故国陆沉的沧桑巨变,身世也日渐坎壈而途穷,学术与人身上的双重途穷,最终逼出清初大儒清醒而深刻的反省精神。^③顾炎武“经学即理学”的倡导,开启清儒宗经的序幕。在此学术脉动的影响下,鸿博词人有意无意间谋得承旧拓新的文学空

① 刘师培《论近世文学之变迁》,《国粹学报》,1907年第26期。

② 施闰章《学馥堂文集》卷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 钱穆《前期清儒思想之新天地》,《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台湾大东图书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2页。



间。这些淹通经史之士对文学与经学的依存关系亦颇为强调。如朱彝尊向往经术纯粹、文章尔雅,他对唐宋派与秦汉派的轩輊,并不是从文学趣味上的偏好出发,而是基于其文是否本于经学,而不问其派属秦汉或唐宋。他认为唐宋派之文多以经学为根柢,秦汉派之文在这一点上显得薄弱,故不足取。^①这种对秦汉派与唐宋派的调停眼光,对清代前期古文主潮的演进方向,不失为重要推动力之一。

“毗陵四家”的并称,以陈玉璫、邹祗谟、董以宁、龚百药合刻《毗陵四家文集》、合力编纂《文统》,在古文领域黽勉同心而得名。正如龚百药所称,“吾党之文不传可不作,思所以传,必求端于经”^②,毗陵四家对“《史》《汉》、唐宋大家之文”的倾心和志在经学根柢的趣味,反映了清初文坛从遗民文章学思想向庙堂正统文学过渡的特征。《文统》的编纂是东南文望与官方背景结合的产物。四人生逢清初政局趋于晏安之际,仕历处在达与不达之间,能感奋于志士用世的时代机缘,不乏励志博学的事迹。他们力学济世的豪情也颇受乡先贤唐顺之的激励。常州武进唐顺之是明中叶兴起的唐宋派主将,于学无所不窥,自天文、地理至兵法、勾股无不探究。“毗陵四家”以荆川古文之学为楷模,意气豪壮,颇怀经世载道的热情。但四人中邹祗谟、龚百药身陷康熙奏销案不仕;董以宁遇不副才;陈玉璫中进士后长期赋闲居家,甬上布衣文家李邕嗣撰《学文堂集序》,赞其“生平所嗜在读书,无世家子弟閤侈华靡之好足分其所嗜……自假休沐归里,更命其读书之所曰‘学文堂’,虽身为荐绅先生,而中欲然常若乡弟子”^③。加上他们的师友渊源中不乏遗民逸士,所以四家文学及文学观上的成就便不乏内在的沉静之功。陈玉璫“学文堂”接纳大江南北趣味相投之士,遗民魏禧兄弟、任源祥等都曾在此寓居,切磋探讨古文和学术。四家于康熙初年开始集体编纂《文统》,初拟名《文起》,又有《皇清文统》之称,接纳“四方投赠之文不啻万计”,选择标准定为“求弗畔乎圣贤之道而后登之”。陈玉璫《文统序》承认编纂“得当事之助”,隐然配合朝廷的“文教之兴”。大学士魏裔介于康熙四年至八年(1665—1669),编纂《圣学知统录》《圣学知统翼录》两书,以“羽翼圣道,鼓吹六经”自命。康熙六年(1667),陈玉璫中进士,在京师与魏裔介结识,受其影响,并受嘱编纂《文统》。康熙帝于亲政当年即命魏裔介祀至圣先师,后又在《日讲四书解义序》中更明确地表述儒家道统与清朝治统密不可分:“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道统在是,治统亦在是”。陈玉璫等编纂《文统》之举,是最早预示这一政风的文章选本。不过,《文统》编纂并不一帆风顺。康熙八年、九年董以宁、邹祗谟相继去世,继而龚百药志趣转向。除了人力变故外,经费筹措亦不易。陈玉璫《奉答魏相国书》曰:“此书果能告成,有功前贤非小,然剗剗之费浩繁难办。梅村先生深以为虑。台札云:‘需好事者其成之。’未卜应属谁人?阁下主持文教以

① 青木正儿著,杨铁译《清代文学评论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85页。

② 陈玉璫《学文堂文集》卷二《龚琅霞文集序》,上海书店出版社1995。

③ 陈玉璫《学文堂文集》卷首,上海书店出版社1995年版。